

中国学科现代转型丛书

李喜所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李春雷 著

留美生 与
中国历史学

留美生与中国历史学

李春雷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美生与中国历史学 / 李春雷著. -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5

(中国学科现代转型丛书)

ISBN 978-7-310-03145-0

I. 留… II. 李… III. ①留学生教育—研究—中国②史学史—研究—中国—民国 IV. G648.9 K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394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4 插页 242 千字

定价: 2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导 言

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提升国运。对于个人，知识既是生存的本领，也是妙不可言的精神享受；对于国家，知识既是繁荣昌盛的根基，也是民族精神升华的食粮；知识犹如衣食住行、阳光雨露，关乎生存，命系国强，不可等闲视之。在中外历史上，凡是成功人士和强盛的民族国家，与其说是实力强大，不如说是知识深厚而有活力，文化强势而有生机。故而，探讨知识积累的途径和方法，研究知识的更新和转化，就是一个意义深远而不可或缺的大问题。《中国学科现代转型丛书》的创意与缘起，即在于斯。

在现代社会，除了历练人生的生活体验性知识的积累外，人们获取知识的最主要渠道就是比较规范、发达的教育。教育的现代化、科学化，与知识的积聚和攀升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没有系统、规范的教育，只有围绕获取官位的比较凌乱的官家和私家的封建教育，知识的积累途径和更新过程，都极其缓慢、单一、陈旧。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新式教育才突破传统，慢慢滋生蔓延。先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东南沿海建立了几所零落的教会学校；后在洋务运动时期，涌现了20多所洋务学堂。随着戊戌维新的废八股和1905年的废科举，欧美和日本式的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育体制在中国基本确立。小学、中学大致属于基础教育，学科配置并不突出，而大学的学科问题，则和知识的积累、更新、传播和新式人才的培养直接关联，占据文化和文明传承与创造的核心部位。学科还直接关乎大学的培养方案、教学安排、学校规模和管理模式，同时

会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以及基本素质，同时还昭示着知识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于国家和社会，设立什么样的学科，则直接和国家的建设与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在近代中国，现代学科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传统文化的改造，现代文明的创建，大学学科举足轻重。别看一个小小的学科，其思想文化的辐射功能，却是全方位、全社会的。

和工厂、企业、公司比起来，新学科的创建有特殊的难度。先不论资金、大楼、学生来源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就是建什么学科，设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这些最起码的东西，在清末大学初建时，都弄不明白。1895年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和1897年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以及1898年北京大学创建的时候，都是仿照国外，全盘移植的一些学科。至于是否合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和需求，则来不及思考。和学科直接联系的资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硬件的建设也迟迟难以完备。与学科发展紧密相关的软实力建设，则更滞后。按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学科的成长，离不开生机勃勃的学术共同体，也就是良好的学术平台和学术氛围。诸如，和本学科相关联的学术团体、学术杂志、学术会议、学术交流等。如果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竞争、和谐的社会公共空间，则学科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当然，和这些条件比起来，师资更具关键意义。没有杰出的师资队伍，强势学科是根本无法建成的。在近代中国，人才问题始终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

众所周知，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夕就呼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惜他所说的人才，还是古典中国的经世之才，和现代人才距离甚远。如果说到现代人才，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就远离了这个世界，他当然一无所知，更不会了解近代中国新型人才奇缺的困境。尤其是当引进西方生产力的洋务运动启动之后，洋务人才的紧缺，着实让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洋务大员着急。万般无奈，才有了1872年和1877年向美国、欧洲派遣留学生的惊人之

举，从而开启了高级人才培养的新途径。随着 20 世纪初的废科举、建学堂，和清末民国社会文化的变革，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负笈海外，造就了一支中西兼通的新知识群体，成为中国新兴知识分子队伍的中坚力量。值得骄傲的是，留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大体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批人大都有较好的传统文化的根基，对西方文化亦有较多的了解，中西融会，亦土亦洋，他们在带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留学生文化正是传统与现代碰撞与交融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必由之路。现代新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正好需要留学生这样学贯中西的复合人才，所以留学生无可推脱地占据了现代学科发展的核心地位。无论是传统学科的改造，还是新兴学科的创立，归国留学生都是领军人物。因此，研究中国现代学科，最好的切入点只能是留学生。

近 20 年来，我和我的博士生一直将“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作为研究的重点，除了出版 80 多万字的会议论文集《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外，陆续出版和将要出版的博士论文就有近 30 部。择其要者，如：元青的《杜威与中国》、田涛的《国际法与近代中国》、张静的《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刘集林的《陈序经思想文化研究》、刘晓琴的《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陈敬的《赛珍珠与中国》、周德喜的《东文学社与爱知大学》、石云艳的《梁启超与日本》、江中孝的《晚清守旧思想与守旧文化》、范铁权的《留学生与中国科学社》、彭小舟的《学教育的留美生研究》、杜玲的《林语堂与中西文化》、孙诗锦的《晏阳初与中国教育》、童晓薇的《留日生与创造社》、徐曼的《西方伦理学在中国》、毛俊萍的《清末留日生报刊研究》、郭呈才的《当代留美教育研究》、郭晓勇的《新月派文化思想研究》，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需要说明的是，在已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还有 8 篇从留学生的角度探讨中国学科的现代化。这就是：陈新华的社会学、陈志科的教育学、李翠莲的经济学、胡延峰的心理学、裴艳的法学、

李秀云的新闻学、李春雷的历史学、徐玲的考古学。这些学科，虽然多数是引进的，也有的是原有的，如历史学、考古学，但在走向现代的基本路径上大同小异，放在一起研究，可以在比较中求同，在求同中考异，有利于研究的深化。通过多年探索，从留学生的角度研究学科转型，基本包括：1、归国留学生，专业特点、知识结构和文化追求；2、学科特色和基本要素，师资队伍、学科带头人、课程设置、图书资料、实验室以及学科管理；3、和学科相关的社会公共领域，学术会议、学术沙龙、学术交流、学术杂志；4、学科的本土化和学科理论的演变；5、知识、学术、文化、中西文化关系，则是学科研究的基本理论支撑。由于学科研究是最近几年刚刚兴起的学术热点，开拓者的重重困难和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将这8本博士论文出版，既是彰显博士们的辛勤劳动成果，也是求得学术同行和社会各界的批评帮助。我们热切盼望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教。

本丛书的出版是方方面面协作支持的结果。肖占鹏教授身为天津出版局领导，却酷爱学术，他顶住一切压力，全力支持学术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为本丛书的面世提供了基本条件。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教授则千方百计解决出版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元青教授为本丛书的策划、编辑付出了辛勤劳动。南开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认真审稿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提倡和学习。总之，要在这里感谢为本丛书付出辛劳的一切朋友们。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李春雷的博士论文重点研究的是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如果讲历史学科的现代转型，理应对古代和晚清的史学加以考察，但他百事缠身，实在无法增补，为尽快使本丛书出版，只好暂缺。希望读者谅解。

李喜所

2009年3月10日于南开大学书来堂

自序

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以后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开始了对于文化传播和文化安全相关议题的研讨。在中国国内,有关文化传播和文化安全的研究大都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的,因此大体没有超出政治学的范畴。进入21世纪,学界不仅深化了这一思路,而且在相关议题的研讨视野上开阔了许多。如有学者就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文化传播历史作了辨析和梳理;有的则透过世界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镜鉴,对文化传播与当前文化建设问题予以理论的阐释。

事实上,文化安全是指文化主体(主要强调文化的具体载体等)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成果的认同、尊重和保护等方面的危机感。换句话说,文化安全更多的在于强调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集体认同,上升到比较高的层面则是知识界对相关问题的反思和研讨。如果我们把这一问题放在传播学的视角下,且回到文化安全自产生之日起的大的历史情境中去,就会发现,时下中国文化发展中遇到的“安全问题”都会从中汲取有效的营养。

虽然西方学界的“冲击—反应”模式一直成为国内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但笔者仍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发展,较之侵略所带来的看得到的破坏和损失更甚。原因在于,中国以往所走过的任何前进的步伐,都是从中国文化的内部生发出来的一种内源性表达和需求,鸦片战争的硝烟则强拉硬扯地把中国文化拖进了现代转型之路,换言之,中国这次大规模的文化传播是在国家文化安全架构面临摧毁的前提下艰难起步的,因此,尽管历史情景已是

绝然不同，但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和时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窘境则有许多相契合之处：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严重“入超”；中国文化传统的道德评价体系、共同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面临着被广大国人“背离”的局面。

也恰恰是这次源于一种文明想要征服另一种文明的文化传播的不对等性，使得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启程带有了悲壮色彩，并且在一系列的努力中带有了扭曲和变形。如经过先贤的努力和探索，洋务运动终于拉开了序幕，但这次本为拯救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却在近20年的努力中，仅仅将着眼点放在了经济层面，而对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改革和文化创新置若罔闻，因此不会也不可能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观念，于是苦心经营的洋务事业没有经得起甲午一役的考验而一败涂地。《马关条约》屈辱的城下之盟不得不把中国推向了维新变革的轨道，并最终形成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可维新变法只维持了短短的一百天，就因国家内部的斗争而失败，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中国再一次步入文化和政治的黑暗期。

戊戌变法虽然昙花一现，但以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看，却毫无疑问地反映了中国国家发展的一种文化觉醒。尤其是自这一时期开始，文化传播进入了新的层面，即西学中崭新的政治观、伦理观成为了改造中国知识阶层的工具理性，并最终诞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这应该是西学输入长期影响与中国文化自身发展逻辑交互作用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阶层以整体形象改造社会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以往发展模式的标志。并且笔者有这样的认识：自此以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便具有了与传统士大夫阶层明显不同的特征。

这些新的时代精英，淡化了与政府的关系，心目中民族的地位上升。他们突破了以往的乡土观念，活动范围遍及各大城市。近代

华夏文化的坎坷遭遇，在他们看来大多有一种屈辱感，而同时，又不得不把西学输入的主导方面视为中国近代社会前进与倒退、进步与落后的标志。这直接的后果，是促使了他们自身观念形态的转化。传统的士大夫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为圭臬，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自豪感愈益减少：他们在与西方文化广泛接触的长时间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由于文化视野的开阔，学术认知观念的加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再像士大夫阶层那样为处理好与秉政当局的关系而苦恼，时时萦绕于他们心头的是怎样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用蒋梦麟的话说就是如何很好地吸收西学而避免其负面影响，也可以说，文化传播到了清末民初阶段，文化安全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开始形成。

然而，真正把文化安全意识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上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顶峰，当时讨论的主题归根结底就是究竟选择怎样的文化、或者说建设怎样的文化才能承担起文化拯救国家危亡、拯救国人灵魂的历史责任。当然，对这一时代议题的看法，当时中国的学术文化界并不是一致的。以“后见之明”，无论当时的争论和研讨多么激烈，仔细梳理每一个学术个体，他们思想的深处几乎毫无例外地深受儒家文化价值理念的影响：传统儒家文化的内核本质上是一种入世哲学，它为传统士人设计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向。儒家知识阶层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治国平天下上，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追求中。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也大都是以此作为文化选择的起点的。

如果把当时的文化健将们作为分析的对象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他们在盛赞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于中国文化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如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在此时高唱西方思想的同时，每天仍然圈点《明儒学案》，并从事《节本明儒学案》和《德育鉴》的

编订。而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他根据陆王思想所作有关身心之学的选萃，值得注意的是，在后者的编订中，他对《明儒学案》中的修养论作系统排比时，所依据的恰恰是辨术、立志、存养、省察、克治等宋明儒学的理念。另一个文化界领袖群伦的胡适之，不仅在晚年透露出自己“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文化命题，且在国外演讲和国内演讲具有明显的两歧性，这些都毫无辩驳地说明了传统文化自有其坚韧的文化命脉在延续。

可以说，近代以来的文化传播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在文化设计时不能以隔岸观火的悠闲去直面问题，而时时有大厦将倾的危机感，即文化安全的意识则成为其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游魂。同时，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是无论如何说也不为过的；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中国的文化载体得以检验和反思千年的历史，虽然中国文化步履蹒跚地被迫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毕竟传统中的活跃因子被激活。

或许上述的探讨有“离题”之嫌，而笔者以为，探讨留美生这一群体在民国期间学术上的作为空间，不以文化传播这一主线贯穿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毋宁谈“反思”了。笔者在文中也论述到儒学的流变轨迹，因为忽略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留美生在学术、人生方面的有些做法，如留学异域却怀念“祖国”——虽然当时并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回国之后又通过自己的切身体认一再反思甚至抱怨，这种性格中的矛盾恰恰是与儒学在近代的演进轨迹息息相关的。因为先秦中的儒家文化虽然“在野”并未“独尊”，但至少在“诸子”中也是显学，后来虽然朝代更迭，儒家却总能在官方拟定的格局中谋得一席之地，因此研习“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名理”的义理之学蔚然成风，“政统”和“道统”的关系也因之进入了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认知层面，前近代以来的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观虽然格局上并未出现变动，但自明末清初大的文化传播以来，

内的元素已开始变位和重新布置。

需要强调的是，史家的对“真”的探索和“究天人之际”的人间关怀始终是儒家文明学术价值认知的基础和起点，因此当历史真正迈入了“近代”这个大时代以后，西方文明借助武力闯入史家的价值视野中时，既定的“道”、“义”和历史的统一开始被打破。最令史家矛盾的地方在于，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社会和学术的“无序”状态愈演愈烈，先哲们的苦心孤诣和求索却换来了价值系统的紊乱和价值标准逐渐向西方倾斜，^①聪明的史家于是开始搭建起“西方—传统—现代”的立体坐标，如前所述，他们试图以别国知识阶层少有的悠闲去审视中国的时势，借以体现史家以往的关怀，结果发现，傅斯年是保持着科学的理念来解读史学的，他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论点就是这一理念的最好诠释；“实证学派”的另一代表陈寅恪则以史家的立场——“同情之了解”去摆正史家在历史与道义、历史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中西学术交汇中的冲撞等多重关系中的位置；胡适则始终在不介入政界间的角逐自居，却难改边著述边议政的习惯。事实上，这种试图置身事外的学术理想，虽有其匠心独具之处，但毫无疑问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等社会更迭时所能遇到的时代课题集结在一起时，不管是傅斯年，还是陈寅恪、胡适等都会停留于一种学术努力和学术理想的层面。

相较于同时代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和人间关怀，留学生的学术价值观还有着别样的特质。笔者也注意到，梁启超在总结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时，曾评价说，其“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

^① 当然，这种价值观的“分离”有着它的学术和社会衍生物，即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

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①梁启超以一位亲历者的姿态，把这场运动“为社会所轻”的原因归结为“通西洋语言文字”的留学生没有加入，^②确实看到了问题的部分实质，却没有注意到除了语言层面外，留学生较之国内其他有知识阶层而言，是真正零距离地接触“世界学说”“之本来面目”的特殊群体。其特殊性还表现在，留学生能够全面而系统地介绍西学，并以之为工具理性加入到学术建设的各个层面，笔者曾经从传播学的视角把留学生这一群体称为文化传播的“介质”，应该是不为过的。^③留美生这一群体的特质表现得则更是明显：较之于留学日本的学子，无论是求学环境还是回国待遇，在同一时期都不可同日而语，在研究史学这一“不生利的事物”时，^④不仅有着特毅力行的品格，而且从总体而言，他们的天下观、义利观、伦理观等等的价值体认还有着别样的学术映照。

最后，笔者不得不在“自序”中对包括本书在内的最近几年的研究趣味作一交待，事实上，对留美生与民国时期的史学的发展的研讨，也主要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间断限里，笔者逐渐发现，这一时期有它本身的“特质”：

其一，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学术的相对“空白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这一基点而阐发开来的，因此，从总体而言，其对中学是采取了厌嫌的态度，而对西学是敞开了欢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② 梁启超本人也曾主张要将“世界学说”“无限制的尽量输入”，然其又强调“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而国内又需要有知晓西学“其条理本末”的相关人才，事实上把留学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又提升了一步。详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③ 李春雷、任慧：《媒介与学术——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视角》，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④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迎的臂膀。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经过一场运动的洗礼就消失殆尽了，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与锤炼，中国传统文化练就了少有的韧性。但新文化运动狂飙般的批驳和对西方文化的热烈抱持，又使得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的方向感大失，到底应该奔向哪里，中学西学孰优孰劣成为他们一直追问的问题。这种不停的考量和追问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成为一种激烈的论争。按常理而言，真理愈辩愈明，但由于留给这一段时期的议题太大，以至于每一次学术争论都给人一种无果而终的印象，事实上就造成了中国思想学术发展史上少有的一段“真空期”。

其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是中国学术建设的最关键时期。这事实上是与上述问题并存于世的。一方面中国思想学术界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弥漫着一股朦胧的气息。但问题的另一方面，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并且纷纷寻求与古香古色的中国传统学术的结合点。正是在这种方向感尚不明确的前提下，中国学术开始走出以往的樊篱，相当一部分学科在媒介的鼓荡下踏上了本土化发展之路。更由于中国抗战的特殊原因，即使在抗战结束后学术上的发展，总体上也没有超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水平。

其三，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真正从传统士阶层中离析出来要推到清末民初时期，但是其“活泼期”却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知识阶层少有了初登历史舞台的扭捏，多添了成熟期的几分魅力，其思想上的活跃和活泼恐怕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上（即使至今）是无可比拟的。他们可以自由地借物以抒怀，可以激烈地进行学术论战而私交甚厚，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一种坚持和理念而在政治性极强的会议上拂袖而去，这都是中国知识分子性格中所独有的，亦是弥足珍贵的。唯有如此，学术才会朝着深邃和厚重的方向发展。

其四，这一时期，以报刊杂志为代表的媒介全面参与了学术发

展的每一个步骤，也充当了学术向社会宣扬自己的通道。如果说当今的学术走上了羊肠小道的話，那么最终要归因于学术与社会的联系机制，即需要有效的沟通和互通有无。一方面，学术需要对现实中的迫切问题进行关照；另一方面，社会需在了解学术究竟为何物的基础上而不将其置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这中间，媒介毫无疑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媒介的倾向、性格特征等等方面与此都密切相关。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媒介在此方面不能说做得完美无缺，却也不失为一种典范。^①

当然，笔者的所谓“反思”，正是试图在细微处捕捉以报刊为代表的媒介的现代性元素的显现，如言论出版自由、监督政府理想转变为实际的操作，制造舆论逐步为反映舆论、代表舆论所取代，更加强调客观、公正、独立以及读者意识和市场化运作等等。然而，如果不把这些积极的元素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就会有不切实际的学术推断产生。因此笔者借助“历史背景”式的追溯来从另一种角度还原媒介所必须面对的传统性。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大论争中所反映的知识群体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以及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追求，恰恰与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传媒中的传统因素有关，如传统的力量和时代的局限仍旧限制着传媒的发展，并且与传统的政治因素结合，削弱了媒介的公共性质；媒介在发挥自己“性格”的同时，又无不处处受到政治经济权力“合谋”而生的种种掣肘。^②而笔者恰恰是将媒介的发展与当时社会学术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探讨新社会学术“元素”——留美生在当时学术重镇——史学中角色的扮演，应该是探讨民国尤其是 20 世纪

① 李春雷、任慧：《媒介与学术——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视角》，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21 页。

② 李春雷、任慧：《媒介与学术——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视角》，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8～29 页。

二三十年代学术的演进乃至社会演进的一个有效突破口。当然，以文化传播史的视角来审视这一议题，方能透显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学术等等层面与现在的紧密契合之处。

春雷于瑶湖滴水斋

2008 年岁末

目 录

导言

自序.....	1
---------	---

绪 论.....	1
----------	---

一、选题意义与拙作价值	1
二、学术史的回顾	7
三、研究思路	22

第一章 民国时期留美生研究史学的背景	25
--------------------------	----

一、学政难以两分的社会背景	
——以梁启超、胡适、顾颉刚为主的探讨	25
二、“新史学”思潮方兴未艾的学术背景	32
三、小结	35

第二章 民国时期留美生研习史学阵容分析	42
---------------------------	----

一、研习史学的群体概貌（以留美原因、留美院校等为主） ..	42
二、政策导向与整体阵容的变化	54

第三章 “范式”更新：留美生与新的史学发展	73
-----------------------------	----

一、留美生与民国时期的史料和史料观	73
-------------------------	----